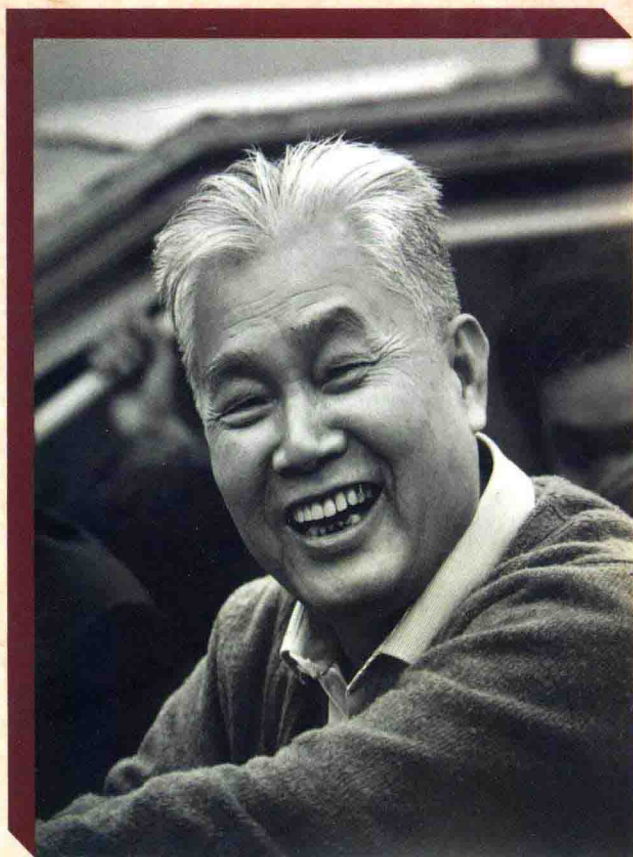




许力以 著



春天的脚步—— 许力以回忆录



華齡出版社

许力以 著

春天的脚步—— 许力以回忆录

柳斌杰



华龄出版社

封面题字：柳斌杰

责任编辑：常振国 程 扬

封面设计：许虹进

责任印刷：李未圻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春天的脚步：许力以回忆录 / 许力以著

-- 北京：华龄出版社，2012.1

ISBN 978-7-80178-891-7

I. ①春… II. ①许… III. ①许力以—自传

IV. ①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1450号

书 名：春天的脚步——许力以回忆录

作 者：许力以 著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29.5

字 数：400千字

定 价：5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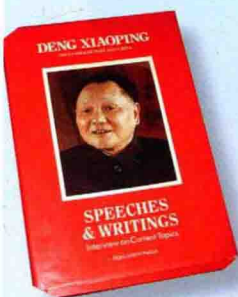
地 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 邮编：100009

电 话：84044445(发行部) 传真：840391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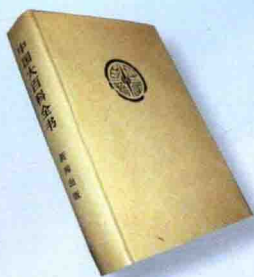


1990年11月许力以於西子湖畔西子宾馆（李芒 摄影）

许力以参与出版工作的部分书刊



《邓小平文集（英文版）》
(1984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
(1980年~1988年)



许力以撰写的著作

- 《人类文明与出版》(1991年)
- 《海外侧影》(1991年)
- 《许力以出版文集》(1994年)
- 《沧江好烟月》(1994年)
- 《中国文化与出版》(日文版 1994年)
- 《东方求索》(2000年)
- 《春天的脚步——许力以回忆录》(2012年)



- 《出版参考》杂志1995年创刊
- 《博览群书》杂志1987年创刊
- 《中国图书评论》杂志1987年创刊
- 《编辑家列传》丛书1985年出版



《汉语大字典》9卷 (1975年~1994年)



《中国出版百科全书》(1998年)



《中国美术全集》60卷
(1983年~1990年)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304卷 (1985年~2011年)



1940年许力以和兄长弟妹们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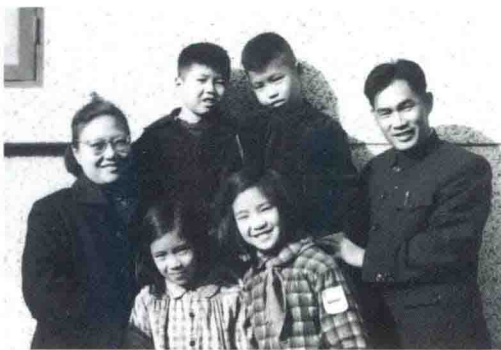
1947年和秦焕如在重庆办事处



1948年在中央马列学院



1962年在广州



1960年全家合影



1970年在宁夏贺兰五七干校



1976年和全家合影



1978年和夫人秦焕如在家中



1985年孙子许晓云看爷爷练书法



1996年在家中



2010年8月30日全家合影



1980年邓小平接见美国不列颠大百科董事长及总编吉布尼（前排左二许力以）



1985年8月邓小平在北戴河接见英国柏格曼公司董事长马克斯韦尔，讨论《邓小平文集（英文版）》在海外出版发行（前排左一许力以、右一刘果、左三朱穆之）



1988年，与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共同出席首届海峡两岸图书展览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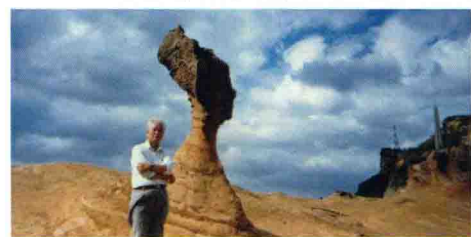
1985年访问美国华盛顿



1997年8月与常振国访问台湾时会见锦绣出版集团许钟荣董事长



1985年访问英国参观莎士比亚故居



1997年8月访问台湾



1980年会见美国不列颠大百科全书董事长及总编吉布尼



1987年访问日本撒伊玛鲁出版社与田村胜夫社长和夫人合影



1985年访问加拿大时会见隆奇教授



1995年出席首届华文出版联谊会



2009年参加“纪念海峡两岸出版交流20周年”活动时与柳斌杰署长等合影



2000年在首都大酒店与丁关根等领导合影



2001年在邓力群同志家中汇报工作



2000年与鄧书林和张小影同志合影



1987年出席《中国美术全集》工作会议，与王忍之、于友先、启功、赵敏等合影



2007年与中国出版促进会周谊、张三杰、常振国同志合影



2002年8月30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为许力以举办八十华诞座谈会



1985年与邵宇研究《中国美术全集》出版工作



1985年~1990年主持《汉语大字典》出版工作



2004年许力以荣获“中国韬奋出版荣誉奖”，2009年入选“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



2004年与《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办公室的同事合影

深切思念资深出版家许力以同志

（序一）

宋木文

许力以同志是我深为敬重的革命老干部和资深出版家。他的辞世，我感到突然，更感到悲痛。我一直这样想、这样看，在比我年高的老同志中，力以同志身心最健康，思路最清晰，虽年近九十，仍然笔耕不辍，直到生命最后时刻，还在为他所心爱的出版事业操劳着。对他突然离世，我实难接受，又不能不面对现实。我回忆着，思考着，许力以的身影在我眼前萦绕。

1973年5月，力以同志从宁夏贺兰中宣部“五七干校”调国家出版局工作，先后任出版部主任和副局长，是我“半路出家”搞出版的领路人和指导老师。我知道他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随军记者，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中宣部出版局担任领导工作，很注意向他学习和请教，他也不时地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给我以指点。我近几天的回忆与思考，也总是围绕这两方面而展开。

1974年“四人帮”发动“反文艺黑线回潮”运动，矛头直指刚从原文化部和原中宣部“五七干校”恢复工作的领导干部，国家出版局机关被大字报攻击为“旧文化部旧中宣部的浓缩”，而从“旧中宣部”被“浓缩”过来的直指许力以。在巨大压力之下，力以同志清醒沉着、善于应对，既能保护自己，又能帮助别人“过关”。当时，被视为重点批判对象陈翰伯（后任代局长）所在出版部党支部，力以同

志多次召开支委会统一我们几位支委的思想，以刚刚恢复工作跟不上形势定调，在不得不开的批陈会议上，大家心领神会，一直坚持“跟不上形势”这个基调发言，并在此后积极支持陈翰伯为恢复出版业务所做的各项工作。

得知力以同志逝世的噩耗时，我正在广东。从深圳到广州，我多次向广东出版界同志讲，1975年我跟随国家出版局负责人徐光霄、陈翰伯、许力以来广州，在羊城宾馆（今东方宾馆）参加《中外语文词典十年（1975—1985）规划》会议的情况。此次会议所定的《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汉英词典》等160种中外语文词典，10年后陆续出版，成为新时期出版繁荣的基础性和主体性工程，影响巨大和深远，直至今日仍然是书写新时期出版成就的重要选项。在制定和实施这一宏大出版工程中，陈原所主持的工作班子起了重要作用，而许力以作为当时的出版部主任和随后的主管副局长，不仅参与了策划，更在组织协调和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力以同志还直接组织领导了由四川、湖北两省负责的《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工作。1979年11月2日，他写信给胡耀邦，拟在四川成立编纂处作为执行机构，胡耀邦于11月6日即作出批示：“请川、鄂两省有关部门大力协作进行。希望全体编写同志同心同德，克服一切困难，完成这项有历史意义的工作。”耀邦同志对力以同志信的批示，使《汉语大字典》以及其他词典编纂起步阶段面临的机构不确定、人员不稳定、财力无保障等实际问题得到解决。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力以同志作为王匡、陈翰伯两任局长的主要助手，对出版界的拨乱反正作出了重要贡献。1977年，他坚定地支持王匡推倒“四人帮”强加给出版界的“两个估计”（写入毛主席批准的中央文件，称：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界是“反革命黑线专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统治地位”），极大地解放了出版生产力。1978年，他坚定地支持并组织实施了王匡决定大批量重印新中国成

立以来出版的35种中外文学名著，极大地缓解了“文革”造成的严重书荒。1979年，他坚定地支持陈翰伯在长沙会议上确立的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书方针，并在实际出版管理中指导地方出版社扩大出书范围和提高图书质量，有力地推动了从地方到中央的出版繁荣和发展。1980年前后出版界的拨乱反正，始终以清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为主线，突破出书跟着当前政治运动转的狭窄局面，使各级各类出版社迈入图书品种丰富、特色突出、质量提高的新天地。在这方面，力以同志不仅成为国家出版局主要领导人的得力助手，而且还有着自己的独特贡献。这是为王匡、陈翰伯以及其后的局领导班子成员所公认的。

198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成为新时期指导出版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在《决定》起草前向中央汇报提纲和随后起草《决定》的工作中，力以同志都是积极参与者，并且给有关同志以具体帮助。国家出版局党组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工作向中央汇报提纲送审稿，遵照中宣部领导同志意见，按1981年中央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精神，对几年来出版工作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一切向钱看”影响出现的问题作了检查，并在图书和期刊出版部分增写了有关内容。力以同志对这一段作了使我认真思考的批注：

“老宋：根据现在的形势和要求，繁荣创作和出版方面的内容要增加，还要积极一些才好。”力以同志对重大政策性问题一向深思熟虑。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即或在重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形势下，在指导思想和政策掌握上也不要搞得太紧、太窄。据此，我在汇报提纲中加进了“进一步把出版的路子搞宽，把出版工作搞活”的内容，强调了“在社会主义方向下的学术讨论的自由、各种文艺形式和风格竞赛的自由，使创作和著述繁荣起来”。实践证明，把路子搞宽搞活，促进了出版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对《决定》的起草，他更重视解决影响出版事业发展的实际问题。为在《决定》稿中如何写入“出版

单位的利润（包括外汇）基本不上交，或采用大部分留成的办法，作为发展基金”；“出版部门由于纸张提价而增加的支出，由财政部门给予补贴”，力以同志“邀请王益、宋木文、徐荇（《决定》起草小组负责人）等同志开会商讨”，上报邓力群并中央书记处。出版部门至今享有的优惠经济政策，多来自1983年的《决定》，力以同志为此所作的努力却鲜为人知，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写出。

力以同志对出版工作的指导，始终把促繁荣、上质量、抓重点放在突出地位，在几次面临调整和整顿时也绝不放松。他对中外语文词典编写规划实施的宏观指导与其中的《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对《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的编写，对《中国美术全集》（60卷）和《中国美术分类全集》（304卷）的出版都倾注全力，抓了再抓，直至完成。

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的步伐，组织和推动出版界的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是力以同志工作中的一大亮点。比如策划和推动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邓小平文集》英文版，策划和推动中国人民美术出版社与日本讲谈社合作出版大型画册《中国之旅》，策划与推动中国多家美术出版社与比利时范登出版公司合作出版60卷《中国美术全集》法文版等，都是力以同志在1979至1985年间全力支持与组织的重点对外合作项目。他还主持制定了对外合作出版的文件，经国务院批准下发，以指导和推动中外出版交流与合作的有序发展。

对改革开放后列入党和政府议事日程的版权工作，力以同志是热情的倡导者和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他协助和支持陈翰伯在国家出版局建立版权研究小组，开展版权立法调研，启动版权法起草。1985年，在中宣部出版局长任上，他主持起草了中宣部关于我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的报告，这一年的6月24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成为尚在起步阶段的我国版权管理和版权立法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并确立了我国加入国际版权组织和处理中外版权关系的基本原则。

力以同志对两岸出版交流与合作作出了突出贡献，是两岸出版交流与合作的开创者。两岸出版界一致认同，1988年，经力以同志的精心策划与组织，并同上海市长汪道涵一道出席开幕式的上海“海峡两岸图书展览”，开启了两岸出版交流与合作的大门。以此为标志，两岸互办书展常态化，其他方式的交流与合作也随之开展起来。力以同志还率先访台做调研，广交朋友，为随后在台举办内地书展、开展深度合作和派团出访探路。许力以也深得台湾出版界同仁的敬重与怀念。

力以同志高度关注出版理论工作，重视出版研究机构建设，重视出版教材建设，重视出版专业人才培养，重视开展图书评论工作。他以身作则，亲自动手写文章，文风朴实，深入浅出，《许力以出版文集》等著作是出版人必读的好教材。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总论”的《出版与出版学》，影响广泛持久，成为他出版理论的主要代表作。

力以同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党和国家出版管理机关担任领导职务。60年来，参与和主持出版方面许多重要决策和这些决策的组织实施，主持和指导过许多重大出版工程项目的规划和实施工作，是新中国出版事业发展历程的推进者和见证人。我们不仅要缅怀他对出版工作的重大贡献，更要总结和学习他指导出版工作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从而在思想上得到宝贵的启迪，以做好我们今后的工作。

力以同志给我印象最深、启迪最大的是他真正做到了不断解放思想、一贯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做好出版工作，离不开国家的大形势。当国家大局出现了新情况时，他能及时调整自己的思想，适应新形势；而当形势错综复杂、众说纷纭时，他能保持清醒和冷静，沉着应对。特别是在社会转折时期，能够抓住机遇，提出新的主张，推进出版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力以同志从党和国家出版领导岗位退下来后，给人的感觉主要是换了个位置：岗位上退了，思想没有退；职务上退了，责任没有退。这正如他1993年在出版文集自序中所作自励与自省所言：“出版工作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作为出版战线的一名老兵，我将继续学习，与同志们一起，为繁荣出版事业，为加强出版的科学研究，提高理论水平，竭尽余力。”他全做到了，直到最后一息！

我在这篇追思文写完后，看到许虹进传来他老爸亲笔书写的临终遗言。这位老革命、老出版在生命最后时刻所写的《我最后的几句话》，深情地倾诉了他对党的事业的热爱与忠诚，真诚地表露了他一生奉献的出版事业的眷恋与期望，而更令人感动的是他所交代的后事全都是他所主持并操劳了25年之久、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304卷）的未竟事业。作为他的“最后希望”，他请“中宣部与新闻出版总署给予最后支持”，将未完成的24卷“加以全部完成”，并表示“我在此致以敬意”。我想，无须多说什么，我们所有出版人，都被许老对人民出版事业的无限忠诚和高风亮节强烈地震撼了。

力以同志，我深情地思念着你！

（作者为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原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

像力以同志那样做事做人

(序二)

邬书林

力以同志是我敬重的老领导、老同志。我敬重他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我的出版工作的引路人——在我工作和成长中，他给了我诸多的教诲、指点和帮助，使我较快熟悉出版工作；我敬重他，更是因为在我心中，力以同志是一个信仰坚定的人，是一个尊重科学、讲究工作方法的人，是一个工作勤奋、关爱他人的人。力以同志是我永远的老师 and 学习的榜样。

力以同志是一个信仰坚定、为党的出版事业奋斗终身的人。力以同志的一生，始终以坚定的信仰为党和国家工作。难能可贵的是，他能把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对文化事业的追求、对出版工作的热爱、对出版规律的把握，在工作中有机地结合起来。他总是千方百计、务实有效地把党的方针政策贯彻到出版工作中去，落实到推动出版业繁荣发展、推动出版改革和加强出版管理的具体工作之中。

这里我记叙几件1982年我到中宣部出版局工作后亲身经历的事情。力以同志在1982年重新回到中宣部任出版局局长，直至1986年离休。那个时期，我们国家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加快发展、加强管理的任务都很重，是我们国家的重要转型期。“文革”结束后，国家工作重心刚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久，国内外的各种思想相互激荡，各种思潮兴起，新旧观点碰撞十分激烈。出版作

为重要的思想文化阵地，往往成为思想文化工作的焦点和各种矛盾的交汇点，各种思潮都在出版物上有所反映。当时有人戏称，做出版工作，左不得、右不得，快不得、慢不得。可以这么说，那个时期在出版局长这个岗位，面临的挑战是很多的。力以同志在工作中，以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底、对文化工作的热爱和对出版工作的准确把握，往往能把领导同志的要求、文化界的想法和群众的呼声，通过一批批优秀的出版物，通过一套套丛书的出版，较好地结合起来，进而保证出版的繁荣发展。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面对当时“信仰危机”的讨论，力以同志按领导同志的要求，组织出版界规划了一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坚定信仰的图书。比如《祖国》丛书，介绍中国的历史，介绍当代中国的变化；另一套《中国地理》丛书，集中展示了中国的名山大川；其他还有《青少年道德教育丛书》，《当代中国》丛书，《中国美术全集》等，都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他用出版好我们倡导的书的办法引领出版导向，影响社会和读者，产生了较好影响。

为了更好地发挥出版传播知识的功能，了解古今中外的学术进展情况，力以同志根据邓小平同志“系统翻译世界学术名著”的指示，组织制订了系统翻译世界学术名著的文件，要求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介绍世界文明的成果，开阔国人的眼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国外的有益经验。目前，我国每年都引进介绍一批国外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历史方面的学术著作，这和当时制订的这个文件有关。

力以同志在他临终前不久写的《我最后的几句话》中写到：“我从小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我现在活到87岁，不知如何感谢党与人民的培养。我临终前，我对党致以无限的敬意。”

力以同志是一个尊重科学、讲究方法、讲究实效的人。力以同志在工作中，很少有豪言壮语，很少高谈阔论，很少提一些大而无当的